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上海女人

1.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三胡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

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共安全专家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共安全专家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各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

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杆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罌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

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

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带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2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

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

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捱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

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搽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3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摇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

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啰，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档。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投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理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

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來。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

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

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的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

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话。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話，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來，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4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头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晃，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脏。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呢？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要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

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人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5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

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

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

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

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的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看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

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

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

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剃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

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的变成畜生了！

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

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

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6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瞳蒙。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服，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E1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

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茆茆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

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

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

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人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茭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

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

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

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

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

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你会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嚤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7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

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

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

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

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

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

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锹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锹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锹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

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

8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

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的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

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

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

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 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

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

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

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

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

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

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9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

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

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

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

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摇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

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

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

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

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丁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1 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揣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

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风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风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风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风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风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藉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2 陈家琪：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

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么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么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么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么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多说一句“跟着KB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么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么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么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么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么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么？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能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见该书第141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个让人“怕”的东西。

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

记来了。”（第 59 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一个在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 63 页）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子松了吗？”（第 128 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子松了吗？”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么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 166 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么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 182 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

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 Morin）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杨林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200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且希望我能写点什么。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来有什么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

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 走进夹边沟

杨显惠

1

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五十年代。县政府称为县人民委员会。)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

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书记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培训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題。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

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

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

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

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

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 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 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 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 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 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

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2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

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24岁。

我看你不像24岁。你年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

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揉，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Mao. ZD 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Mao. ZD 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的对，你写的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

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

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

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共安全专家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共安全专家特派员，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共安全专家局副局长。公共安全专家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共安全专家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共安全专家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

3

全抓起来之后就和他们押到了公共安全专家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

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匠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共安全专家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共安全专家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

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

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共安全专家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室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带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共安全专家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线，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线。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共安全专家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讲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

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投来。

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

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

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

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恶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轰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

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4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

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

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 58118 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共安全专家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共安全专家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共安全专家局副局长赵正方。

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

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

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共安全专家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目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

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问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

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您，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驿站长

杨显惠

1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爬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

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48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20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21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28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20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

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投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45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

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60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

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

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

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

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省和新疆省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

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诺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

2

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傻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反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

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钰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

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

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

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二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车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厂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3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

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对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憊，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

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

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

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 ammo 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嚼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

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

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

4

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共安全专家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

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让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JUF]口去了，——T~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67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们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

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时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

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

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

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

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人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人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

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

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

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60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去当专职教师了。

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30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

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糊口，30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糊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

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画像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的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

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

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

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

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共安全专家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投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投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

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

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

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

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

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对我说：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耨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

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40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

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24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

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時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良良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

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

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

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倒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8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

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掀。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

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于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

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

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

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

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大间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共安全专家局逮捕令。

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

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

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像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像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带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

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共安全专家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共安全专家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70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邹永泉

杨显惠

1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减步到七两。

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我们来到夹边沟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

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的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

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

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投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刻，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

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

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铮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

我们的恋爱关系\*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

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2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睛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

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糊糊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几出）《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

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小……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

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暖暖，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于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

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

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3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

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懈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我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

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

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15斤，给15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15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5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辞很坚决。他说：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EI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5~，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

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水天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元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

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 t1，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 30 岁出头，他的儿子 8 岁，刚上小学。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口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

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锹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将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这就好了

杨显惠

1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

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太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

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共安全专家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

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

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他\*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

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

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公尺，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

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您们医务所的领导哩？

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您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

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公尺到一百公尺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

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

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

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律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再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天，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

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投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您姑娘和女婿知道您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3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

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

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 30 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屏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

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 21 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堂兄，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对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 60 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

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

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 4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卜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了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在列车上

杨显惠

1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三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三义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拘捕了两个人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三义市公共安全专家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三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58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三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三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的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齜齜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捱，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

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

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

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16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

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三又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

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睬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钱钱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罗嗦什么，舍不得钱啦？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自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也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的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

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冲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的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耍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

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入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罗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你自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糊糊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 he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回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1 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一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30 年啦，我们 30 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三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 1957 年 10 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退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共安全专家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共安全专家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共安全专家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 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

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共安全专家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

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道，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共安全专家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

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于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胞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

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3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

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

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50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下半年就降为

30斤，转年又减到26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

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

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公尺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

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公分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公尺四五十公分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捱延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将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

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

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速的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

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河西走廊地区降水量小，农田都是水浇地。为了增加收获。农民在无灌溉系统的荒滩上开垦土地耕耘播种，遇到雨水多的年份，便有一定的收获，若雨水少，便颗粒无收。耕种此种田地有着撞大运的意味。人称撞田。），撞田左近的鼠穴里老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老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

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

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柞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捕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

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在监狱和劳教农场。管理部门利用犯人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

4

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

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

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搬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喇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共安全专家，我可知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睬，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睬他们，仍然喊：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的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禀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知尝闻……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

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

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胀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捱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讲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

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5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

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东西，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那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的，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管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

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

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

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共安全专家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

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进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

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作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

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

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般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把。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地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致。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二三百公尺，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公尺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共安全专家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

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三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渡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30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28岁，他24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30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

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30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30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

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共安全专家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三又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啥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那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作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的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

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 告别夹边沟

杨显惠

1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在这片荒原上，要到8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7111JL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

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蹒跚，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一日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的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

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

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

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投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

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沥沥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零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咒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河西地区寒冷、干旱，不能种冬麦，为了来年墒情好，人冬时必须灌一次水，而灌水又要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进行：永一灌进地里就冻成冰，像棉被覆盖土地。来年冰化雪融时节，土地便像发酵了的面团一样松软，适宜播种。）

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咒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公尺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

mpanel (1);

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公尺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沒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

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投觉得恶心吗？

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蓬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

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一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明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 2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公尺，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公尺，上边横了一根园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公分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

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暖暖，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暖暖，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

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 40 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

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 1957 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

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

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揍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地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

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

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

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mpanel (1);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两个人说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

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挑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炒熟或蒸熟的面粉），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1：1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

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个毛背心。

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

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麦糖）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

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mpanel (1)；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噢，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太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

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變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4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

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共安全专家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

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于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

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

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

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大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人力车，也叫排子车。）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着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

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

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

mpanel (1);

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大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

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

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

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即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斯匹林。

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

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

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 5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大——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

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

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

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

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墓。坟墓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公尺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后记：王永兴出身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

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怀乡思亲二首 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

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

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

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

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

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坚持到底

杨显惠

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稍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

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公尺高，百多公尺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墩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

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

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眩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15斤了。24斤都饿死人，吃15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

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不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

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02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的像破碎

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

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

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那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

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去，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

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礼，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

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公尺宽，十几公尺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跟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03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动些，还是自动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的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

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

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硬，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湿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r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将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

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来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

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

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

干什么？胡永顺说，暖暖，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西北方言，有双重意思。一是指时间，时光；另一含意是指生活状态，生活来源。此处指后者。）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

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仅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

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

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

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美：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

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

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22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尹。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苇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

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捱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冽冽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曜曜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一队的人都到二号

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05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残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暖，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缩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

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

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锹……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哪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

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06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日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

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

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

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

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叭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叭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得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

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叭哒叭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漓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于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

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E1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自己地哭出声来：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

…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

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

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

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公尺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一号病房

杨显惠

01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

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

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的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投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还真的是。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的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

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

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

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河西走廊干旱少雨，耕地均为水田；在没有水源的地方开垦的土地叫撞田，因为天下雨才有收获，无雨则无收成，有撞运气的意味。）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

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

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

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02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趣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

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

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

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

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

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

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

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掂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档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

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好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

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

这几个人是杂役（在劳教农场里做炊事员、木匠、鞋匠等工作的劳教人员，总称为杂役。），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投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

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

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

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穗，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公尺宽四五十公分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公尺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

03

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问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

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

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汉祖吗？哎呀，老李，你也病了吗？李汉祖说，不病了能到这里来吗？陈毓明听出来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音，便在铺上坐下来，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问，你怎么了？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眼睛泛着泪光。他哽咽着说，老陈，我活不成了。陈毓明问他得什么病了？他身体一歪倒在铺上，哎哎地哭出声来：老陈，我的胃痛得受不了了。因为灯光太弱，看不清李汉祖的表情，陈毓明喊了一声，小艾，把灯拿过来。艾学荣把墙上挂的风灯提了过来，他才把李汉祖拉得坐起来，看着他哭得变形的脸说，你说，你说嘛，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吃了炒面了……

炒面？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炒面是好东西，我想吃还吃不上……

我吃多了。

吃了多少？

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

你都吃了？

我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

一斤炒面没关系，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

我心里饿，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

陈毓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说，你吃得是多了一点，但也没啥问题吧。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来的时间不是也吃过两斤吗，八个馍，还喝了两碗菜汤？

那是刚来的时间，现在胃不行了，薄了，吃多了受不住。

你不要胡思乱想，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在夹边沟，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一个人吃光了，也没出啥事。

那是面汤，稀的，尿两泡就啥事都没有了。

陈毓明给李汉祖宽心，但心里揪得很紧，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刀绞的一样。

那是有胃酸。胃酸多了就是要痛的。叫医生看了吗？

看了。苏大夫看的，给了些泻药，不管事。

吃药多长时间了？

两个钟头了。

两个钟头不行。你想呀，你过去有过积食的经验没有，中药丸子藿香正气丸吃下去，半天一天才能起作用。你才吃了两个钟头，就想好，那不可能嘛。

不一样，不一样，老陈，我真是要死了。不光是刀绞的痛，还胀，胀得疼，胀得坐不住。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唉哟哟地呻吟着，把头杵在铺上，身体拱了起来。陈毓明看着也很无奈，便跑出去找医生。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茭茭草席扎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护士告诉他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

他满沟里跑来跑去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立即摇着头说，你去准备去吧——给队长报告去，那人没救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的胃要撑破的。陈毓明央求他：你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再给些药。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但却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药吃下去不起作用。

陈毓明叫李汉祖喝了药，然后就回南房去了。他还惦记着那屋的病号呢，也该吃饭了。

在南房吃完了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

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厅的同事，转业兵。他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厅二处当外勤——侦察员——的时候，李汉祖做内勤工作。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今年二十八九岁。就因为年轻，饭量大，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陈毓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缸。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茭茭草席棚子，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嚼手指头。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为了多舔几口糊糊，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我捣你一拳，打起架来。有一次李汉祖被别人推得没舔上几口糊糊，就急眼了，耍起他当警察时的蛮横劲头来，打了一个年轻人两拳，又把另一个人推到一边去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日的，你跟我抢，老子收拾你……

…那两个人是个比他还年轻的小伙子，哪里能受这个气，两人团结对敌，把他抱起来塞进饭缸里。李汉祖头朝下窝在缸里噢噢叫，爬出来之后头和衣裳沾满了糍子样的面糊糊，可真是狼狈极了。他也不舔缸了，追着打一个小伙子。还是陈毓明看见拦住了，说他：哎，你把公共安全专家厅的脸都丢尽了。

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又在墙根蹲着。还是忍不住的疼痛，就又栽倒铺上窝着。陈毓明无法帮助他，问他：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他只是哼哼，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

陈毓明又问，小肚子那里有响动吗？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说，胃胀得要破了。老陈，我实在不行了，非胀死不可了。

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滴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连着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的陈毓明决定要好好睡一觉了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用过的被褥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档处铺好被褥，连衣裳都没脱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

病房设立之初，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以便二十四小时随时伺候病人。可是病号太多，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

04

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或是在死亡病号空出的位置打游击躺几个小时，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

但是这天他还没有入睡，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他抬头看了一眼，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像是张永伟。

那人进来后转身关门。门一关上房子里就暗了下来，那人站了几秒钟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才往前走。这时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这就是张永伟。陈毓明才把头放在铺上。作为护理员，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有些人品格很低下，偷别人的食物。

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中学教师。他也是病号，住在四号病房。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还能到处走走。他走到张继信铺前喊了一声张老师，就在张继信和蔺为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坐下后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便低着头在蔺为轩脸上看了看说，咦，这是谁？张继信说，蔺为轩，民乐县的副县长。张永伟觉得新鲜，说，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张继信说，他来有什么奇怪的？张永伟叹息一声：唉，想不到呀，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呀，来r就当统计，不下大田，场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从亲朋好友那里要几十斤粮来。张继信说，大厦将倾，独木何为！张永伟说，噯噯，想不到，想不到……

张永伟一连声的感慨着，但过一会儿他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哎，你怎么啦，哭什么？

张永伟哭着回答，我是给你说事来的——赵庭基没了。

张继信沉默一下问，啥时间没了？

昨天晚上。

张继信静默了。

张永伟抽泣着哭，哭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我发现了，叫护理员去叫大夫，大夫抢救过来了。从那天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他，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过一会儿看一下，叫醒了说几句话。昨天晚上不小心我也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哎哎哎……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不停地擦眼泪。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他愈是大哭不止，哭着说，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从夹边沟过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把粮票、把几件衣裳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解完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哎哎哎……张老师，我们那一批来一夹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选……

当时我们 12 个人上的火车……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哭得喘不上气来，咳嗽不止。

张继信不说话，一直静静地躺着。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些了，他以很严厉的口气说，赵庭基死了就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死还是想活？

张永伟止住了哭，静静地坐着看张继信。大约过了五分钟，他说，老哥，你说的话我没听懂，怎么叫我想死想活？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

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

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张永伟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站起来说，张老师，我回去了。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说，回去吧，定定儿睡着去。  
陈毓明根本就没有睡着。他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张永伟走后，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谈话，然后说，张老师，你有几个娃娃。

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房顶，说，一个姑娘。

姑娘多大了？

二十一。

你的姑娘都二十一了？出嫁了吗？

没出嫁。咳，说起我的姑娘，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呀。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间结的婚，上完西北师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又念书，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后来工作了，住在永登，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再后来我把她们接过去了，我就打成右派了。这时间姑娘中学毕业了，就因为我当了右派，她连大学也进不去，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你的娃娃多大了？

我的孩子还小，大的11岁。

你几个孩子？

三个。

娃娃们谁带着？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夹边沟了……

家属和我一样，也是右派。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孩子她带着。

家属和孩子们还好吗？

噯，谈不上好，饿不死就是了。

饿不死就好，饿不死就好。

饿是饿不死。女人来看过我两趟，说高台的场长是白怀林。

白怀林跟我熟，跟我家属也熟悉。我们两口子在公共安全专家厅工作时，白怀

林在公共安全专家厅当总务科科长。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照顾，叫家属当统计，按就业人员的待遇，娃娃们管吃管穿，还给了一间房子住。

噢，遇上好人了。

对，白怀林是个好人。在公共安全专家厅的时候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就是没啥文化，后来弄到高台农场当场长去了。

陈毓明沉默一下又说，张老师，你上过两个大学？

05

张继信回答，两个大学。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学的历史。上完西北师院又考的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又上英语系，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

念了十年大学！

听见陈毓明惊奇的声音，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

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工作了几年，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我也经过了，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

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没读上万卷书，但五千本书是读过了，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

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

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

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12月初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接近明水农场时拐个弯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她高大削瘦，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

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她对这儿的的路像是很熟悉，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接近山水沟的时候，她朝着一号病房走去。但是她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便又绕开去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在这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她短促地喊了一声：老陈。

陈毓明也看见他了，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晃眼，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说，哟，你来了？

我给你送点粮食来。你干什么了？

陈毓明朝着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么，才把几个人……摆好。

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她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去？

我们正要到南房去，我现在当护理员了，伺候病人，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你过来没看见吗，那门口横哩竖哩难看得很。那就这样吧，小艾，你回去吧，不搬了。这是我爱人，看我来了。

艾学荣噢了一声，转身回北房去了。陈毓明走上台地来，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说，走吧，到房子里去吧，外头站着太冷。

女人已经快冻僵了，跟着他进了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认识女人，打招呼说哟嫂子来了，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了。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一点也不惊奇，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陈毓明说我给你倒点开水，女人说不渴，但他还是倒了一碗开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倚着墙蹲下。他问，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跟送粮的马车来的。听说明水断粮了，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在磨上粉碎了一下给你拿来了。就几斤。

一斤也好呀！断了三天粮了，天天吃树叶子糊糊。

树叶子糊糊？

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末末，煮上一大锅吃，一把面粉都没有。昨天去了两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天黑时分回来，说是粮食没磨出来，拉来了两车莲花菜（西北方言：即元白菜。）。昨晚上、今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晚饭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我就是坐送粮的车来的。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

拉粮去的人说的。

说是没磨出来。

什么没磨出来。我听说夹边沟那边没粮了。你们这两个月吃的粮都是从夹边沟拉过来，在高台农场加工的。这几天没粮食了，从张掖专区要了些豌豆，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可是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

那就多拉些菜来嘛，夹边沟的菜长得好，为啥吃树叶子？

长途拉运方便吗？马车来回要走几天。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

女人不说话了，看着陈毓明的脸静了一会儿，说，你的身体好吗？脸肿了。

陈毓明一怔：肿了吗？我还不知道脸肿了。我的腿在嘉峪关积肥时就肿了，走路时腿发软。

女人叫陈毓明把裤筒拉起来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说，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

陈毓明说，你不要管我，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孩子们能吃饱吗？

哪有吃饱的粮食？饿不死就是了。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

我们总有办法，你不要操心。白怀林送过几次面，还叫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

还送过一块羊肉。

唉，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

女人说说话站起来要走，说是和她在一起的李怀珠也捎了、点粮食给王晓天。

马车卸了粮就要走，她要抓紧时间送去。陈毓明叫她把粮食留下由他送去。女人不干，说李怀珠叫她看看王晓天，要是见不着王晓天，回去不好跟李怀珠说。

陈毓明领着她去找王晓天。找了好几孔窑洞，有人说王晓天也病了，住在四号病房。他们又跑到四号病房去。

06

陈毓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坐上马车。马车要走了，女人突然又叮嘱他：我给你的粮食不准给人。他说我傻了吗把我的粮食给人！女人说，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穷大方。在兰州的时候，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

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回到病房，陈毓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碴子粥。过去了的三天，他虽然没全吃树叶糊糊——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但他真是饿急了。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倒上水，抓了几把小麦碴子放进去，又放进一小块酱油糕，煮了满满的一盆碴子粥。由于是用石磨磨的碴子，颗粒小，还有不少面粉，他的碴子粥还真黏。但是，他这顿饭却没吃好。

他刚刚吃了一半，张继信就喊他：陈队长，我要解手。他放下麦碴子粥去伺候张继信。

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本就是虚弱之躯，又吃了三天代食品，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陈毓明把他拉起来在铺上跪着，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还出了一身汗。陈毓明也扶不住他了，腿一软也跪在铺上。张继信说，不行了，解不下来。陈队长，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陈毓明说叫张永伟干什么？他说大便干燥，叫他给我掏一下。陈毓明说不要叫他了，我给你掏吧。他说，太脏了，还是叫张永伟来吧。没进病房之前，我们将草籽炒着吃，总是大便干燥，便秘。我们互相给对方掏。陈毓明寻思片刻说，张老师，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他给你掏不成了。一听张永伟走了。张继信愣了一下，突然就痛哭起来：那是个好小伙呀……唉嘿嘿。但

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抽泣着说，陈队长，那就只好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脏乎乎的。陈毓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掏了。吃树叶子糊糊，大家都拉不下来。于是，张继信退下裤子趴在铺上撅着屁股，他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边，把勺把对准粪门……

给张继信掏粪便，陈毓明也没费多少事，因为肚子里的树叶子都凝结成粪蛋蛋了，并且挤到了粪门跟前，他用铝勺把儿往外挑，很快就挑出来许多比羊粪蛋蛋大比驴粪蛋小的草蛋蛋。只是掏到后来，张继信说好了，好了，不掏了，他说再掏一下，还没掏尽。他还接着掏，粪门里突然就喷出一股稀糊糊的东西来，躲避不及，一下子喷在他的胸前。他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怎么回事，我给你掏粪，你喷了我一身！

张继信非常尴尬，陪着笑说，对不起，对不起……

掏完粪蛋，陈毓明洗了手，接着又吃小麦碴子粥。吃了几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就端着饭盆走过去说，张老师，把你的饭碗拿来！

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要碗干什么？拿去吧，拿去吧，有用你就拿去吧，就在我枕头旁放着哩。他还在为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说话时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陈毓明不说话，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把自己饭盆里的碴子粥倒了一半进去。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说，吃吧。

温在火炉上的碴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他双手捧起饭盆结结巴巴地说，你吃，你吃……这是哪里来的？

陈毓明说，女人来了一趟送来的，快吃吧。

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他的嗓门也在哆嗦，说，这东西可是金贵呀，还是你吃吧……

客气什么！你的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装了一肚子草末子，你还客气！

陈毓明说着话就回火炉旁去了。他舀了一碗水倒进饭盆里，把麦碴粥搅成稀汤汤喝了下去。

傍晚时分，一号病房又来了七名病号，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每个病号还领到一块四两面（旧秤。十六两为一斤。）的糜面饼子。吃完饭陈毓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了一觉。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又是抢救又是往外拉尸体，白天又忙这忙那，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他认为自己必须睡一觉，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但是，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领导说，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

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十点钟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他才被人叫起来。起来后他就帮着病号打饭，——还是半盆胡萝卜汤——添炉子，伺候几个病号解手。

然后他就大声招呼：喂，坐好了，坐好了，能起来的都起来，不要睡了，大家说说话。

天天夜里说话，病号们都有点烦了，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说话，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陈毓明忙得叫起这个顾不上那个，挺犯愁。他大声地喊，喂，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都说话呀，谁带头说！有人说，你就带个头嘛，你找个话题，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他思考了一下，朝着张继信说，喂，张老师，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叫大家起床，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听见陈毓明问他，睁开眼睛说，你提这事做啥？

陈毓明说，你一说那句话，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你说你看过没有？

张继信回答看过。

陈毓明又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看了话剧，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写出来了，演陈白露的演员演得也好……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

喂喂，《日出》是进步话剧嘛。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陈毓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便说好好好，换个话题。

但这时有人叫起来：谁反映上去？谁反映上去？

另一个人也说，反映上去又能干什么？他\*的，还能活几天呀，你们这么胆小？

放心说，放心说。

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莫谈国事。

还是那个人的声音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

07

陈毓明忙着制止，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我听人讲，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烤成硬片片了，掰着吃。他把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人吃着又香又脆，就说了：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顿悦宾楼的烤鸭。悦宾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

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悦宾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

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得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最香。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二十多人劳动。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有人说他：你说的真话？

真话。我哄你们做啥！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

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那个人说，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噯噯，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有人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为轩是民乐县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毕业生，地下党，当过教员。解放初他曾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夹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

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学生，自他进了夹边沟，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

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把眼光躲开了。

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毓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为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怕大家又要睡觉，便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为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

蔺为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我的话怎么不受听？

张继信说，听你的说话，就像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

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蔺为轩不出声了。陈毓明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招呼大家继续说话，但张继信又说，老蔺，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

蔺为轩看他一眼：你问这事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吗？

有这事。是我向领导反映了。

我不是问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力，说明你思想好，我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块牛肉你吃不吃？

蔺为轩没立即回答，略停一下说，那要看牛肉是哪来的？

偷来的，还是偷来的。

不吃。

真不吃？

真不吃。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蔺为轩没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面对其他病号又说，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蔺为轩的脸色变了，苍白且尴尬。他支吾着说，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

这些人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我看呀，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

命得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蔺为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说，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毓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招惹出什么祸端出来，他坚决地说，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投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进入12月以后，天气格外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来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地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悬着个亮椭圆。

08

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墩红柳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

这天的天气最冷，陈毓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

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毓明这样想。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

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

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毓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

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遮断了。

谁呀？

陈毓明问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塞塞塞塞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愿先说话。

陈毓明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

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上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边，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她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

陈毓明惊讶极了，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

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里住吗？

陈毓明说，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女人说对，是永靖县人，你认得他吗？陈毓明说，程炯明我怎么不认得，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女人惊了一下：他病了吗？

陈毓明说，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

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陈毓明想一想，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找程炯明去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

陈毓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毓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里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严队长问怎么回事，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刮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找来不伤心死吗？散会之后，有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名商人，但又早早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那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

他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布置分队长们调查。分队长问蔺为轩知道谁宰牛的事不，蔺为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伙房旁挖水井，领导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把牛牵到明水

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箭牌的小刀割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便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察看。

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半只没吃完的牛。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送到饮马劳改农场去，可这时明水已到了死亡不可遏止的状况，领导便也没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后还叫他进了病房……陈毓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有人看你来了，程炯明！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头的地方，他正和两个病号说话。

他站起来说，哟，是陈队长呀，谁看我来了？陈毓明说你看谁看你来了。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一声：哟，你怎么来了？

女人没说话，陈毓明说他：怎么，不叫人家来吗，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程炯明笑了一下，陈毓明又说，快，快，把雪打一下，叫上去焐焐脚，冻坏了。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雪，然后又给那个女人和娃娃打雪，并说，焐一会，你们都焐一会脚，等一会儿领你们找老季去。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坐下，用被子盖上腿脚。这时，程炯明才问，你们怎么这时间才到，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

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又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

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禾垛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女人说，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程炯明又说，从清水返回到高台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就那么傻，不会找个旅社住下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

女人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听说这面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敢动呀……呜呜。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且难看。过一会儿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

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季就行了嘛，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女人没哭，只是抹眼泪：老季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说，可怜呀，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他们去找季晨光。

陈毓明说，我领你们去找吧，叫老程和媳妇说话。走在路上，两个孩子都说脚痛，女人说冻着了。陈毓明没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洞口挂着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毓明趴在二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里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精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这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喊了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吗？女人说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女人抬起头来招呼孩子。两个孩子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09

季晨光看看孩子没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陈毓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转身走开。他回到病房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

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呀？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了。季晨光找着了吗？他回答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去。程炯明说，那好。来，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

程炯明递给他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带来的。他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烟可是几年没吸过了。

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骆驼蓬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

陈毓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的面前，说，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陈炯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元钱；在高台县一斤原粮也卖到十元钱。

他说，不吃不吃，叫老程吃吧。女人说，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吧。但女人非要给他，说，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旁边的病号也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毓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

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

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你吸去，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

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就说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还是甜的？程炯明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和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

这炒面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

是红枣。把枣晒干，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味和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陈毓明说吃出来了，程炯明又说，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是真正的炒面。陈毓明说，对，对，我吃着有一股油腥腥的味道，真香。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二棵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鼓捣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精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漂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舀了一口尝一尝。

他亲自到南房把陈毓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送去了一碗。

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生，又没个门扇，不冻死吗？多大的风呀！程炯明说她：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人就睡在那样的窑洞里，那有啥法？

女人说，季嫂和那两个娃今晚上到哪里睡觉去？程炯明说，哪里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伙房送来的胡萝卜之后，陈毓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吧，和其他人隔开。

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人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毓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知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吃吃地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她睡在墙根里，我给她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毓明说，你安排好了呀！

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好几个人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

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毓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她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两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对那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儿行呀？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两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严队长说，没这个规矩！

后来，还是程炯明把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

蔺为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毓明给他喂菜糊糊。他喂饭的时候，看见他的凹陷的眼窝里的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毓明说他：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为轩有气无力地说，她盼着我快些死，死了她好嫁人。陈毓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就叫我。

这是第三天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毓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蔺不行了！

陈毓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蔺为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蔺，你哪里不舒服吗？蔺为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10

陈毓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给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

陈毓明转着脸问大家：你们准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蔺的命。

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

陈毓明拿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

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他说，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炊事员说，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里来？

陈毓明哀求说，病人要饿死了，你们给熬上一碗吧。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毓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想菜团子哪行呀，蔺为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

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老程，你媳妇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

程炯明问他：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他说，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程炯明问谁呀？

一个姓蔺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添墩来的。这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陈队长要炒面来了，我就给些吧，要是旁人要，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程炯明说着，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从一个布袋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他。他回到病房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地喂蔺为轩。

然而，还没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趿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

就问，陈队长，陈队长在哪里？陈毓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

陈毓明知道事情再遮掩不过去了，端着碗站起来说，是蔺为轩不行了。

谁？

程炯明似乎是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声。陈毓明回答了一声：蔺为轩。

程炯明以为开玩笑，瞪一眼陈毓明，凑过来离得很近地看了看蔺为轩。然后他直起腰来一声不吭，一扬手把陈毓明手中的饭盆打飞了。在陈毓明下意识叫了一声之后，他说：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呀！

陈毓明说，哎，你这是干什么？

程炯明却咆哮起来：哼，给他吃，我宁愿把炒面喂狗，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

陈毓明说，哎呀，你也是的，活了半辈子，怎么干孩子们的事。

但程炯明依然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干孩子们的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这个驴日的！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他在那里偷饲料吃。我看着他孽障——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嘛，落到吃马料的地步——就给他一块牛肉吃。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你的牛肉是哪来的？我说偷来的。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我还要告你去。

他真告了，结果开大会批斗我，还捆了我一绳子——五花大绑——差一点点把我的命要了。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人劝他：算了算了，老程，不要跟他执气，他是快死的人了，你还生这个气做啥？

他说，哼，快死的人了，我看他早就该死，死了活该！他越说越气，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在蔺为轩的腿上踢了两脚。然后气冲冲走了出去。

凌晨五点钟蔺为轩断了气。

过了两天，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

时间进入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机的状况。已经连续三天了，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

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艾学荣和陈毓明可是忙坏了：把这个人叫起来坐下，那个人又躺下了，把那个人扶起来。

这个人却休克了。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推葡萄糖。抢救来抢救去，死了。

这又是一个忙碌夜晚，打从喝完加餐的胡萝卜汤，陈毓明就再也没闲着，到凌晨三点钟，光是北房就抬出去了三个人。陈毓明实在是累极了，把第三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档处躺下了。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他和陈毓明一样，脸肿得跟面包一样，但他精神比陈毓明强点，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烤着几块白菜根吃。

躺了不到五分钟，有个病号说，陈队长，我要喝点水。陈毓明懒得站起来就喊艾学荣：小艾，你给倒点开水。艾学荣提起了水壶，水壶是空的，又去看看水桶，水桶也是空的。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陈毓明小憩一下，然后回南房去。离开南房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

回到南房扶持一个人解完了手，他又要回北房去，张继信却又叫他：陈队长，你过来一下。他走过去问要解手吗，张继信说，不解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有事没事？他说北房有人要开水，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了没有；那小伙蹲不住，我不放心。

张继信说，那你去吧，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

进了北房，果然不见艾学荣。那个病号又说要水，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出了地窝子的门，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但壶盖怎么也摸不到，地下到处是冰溜子，手还冻得不行。后来他想天亮之后再找吧，就去了伙房。到了伙房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却不见艾学荣。

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艾学荣哪去了？炊事员说，我是给你看人的吗？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已经有过几次了，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

还真被他堵着了，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他说，叫你打水来了，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艾学荣说，我给大师傅说了，水开了叫我。他说，你再等水就凉了。

艾学荣站起来了，从炉口拨出块什么东西来，在手里敲打着吹着，说，陈队长，你也吃点。

他看出来，那是一团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他说，我不吃，我就想睡觉。

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然后陈毓明就回南房去了。

11

进了房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就走到张继信跟前，问，张老师你有啥事要说吗？张继信说，这阵你不忙了？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谈。

他坐下了，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低头看着躺着的张继信的脸。

张继信想坐起，拉动垂在胸前绳子，但使了使劲儿也没坐起来。陈毓明说他，你就躺着说吧，坐起来干什么。张继信就说：陈队长，这些天我一直想……我能活着出去，可是今天我觉得不行了……

陈毓明惊骇地说：你说的啥话嘛！

张继信说，你不要拦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真是不行了。

这两天我有时喘不上气来……活不长了。

陈毓明说，你说过的，你一定能活下去。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嗷嗷，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懒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的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每天都是傍晚拉尸体，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

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进门时门槛拌了一下，他摔倒了。他双手杵地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就又跌倒了。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有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说他：陈队长，你也成病号了。

你就找个地方躺下吧。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他就躺下了。

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健壮的人来了。

陈毓明在病房躺了一个星期，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工作组逐屋看望了病号，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共安全专家厅的副厅长。姓侯。他认出了陈毓明，对陈毓明说，坚持住，再坚持几天，把身体保护好。正在联系火车，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陈毓明在铺上躺着一直也没说话，后来那位副厅长要走了，他突然开口道：侯厅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侯副厅长说，可以，可以，单位上来人的话就可以接走。陈毓明说，侯厅长，那我请你帮个忙。你给刘场长说一下，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场长打个电话，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

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

第二天，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他把鞭子甩得叭叭响，把马车直接赶到一号病房门口停住。

陈毓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女人进了病房问坐在马扎上的护理员，陈毓明住在什么地方？躺着睡觉的陈毓明听见了，坐起来喊，我在这儿。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车来了，走吧。陈毓明在前边走，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两个人走出病房上了马车。

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公尺，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这里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南华镇距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陈毓明突然对女人说：我们来明水，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

熔车站走过来的。浅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离他们不足十华里。它裤半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它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氏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子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

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公尺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公尺，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公尺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公尺高，人趴着能钻进去。

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

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05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

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锹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理做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

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

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

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

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投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

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敦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埂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

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去世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

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

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想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茕茕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

06

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

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她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

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

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

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

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公尺。

附记：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投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

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公尺，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

1983年我51岁。51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

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30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

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 30 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

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莹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 8 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莹，了如指掌。

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莹又找一片坟莹，把每个坟墓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里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啞，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莹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

07

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我还顾不上来这里呀！后来，到他家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30 年了，我见过的夹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边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石头哪来的，是吗？咳，这事呀，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呀，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呀。后来我问了县公共安全专家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夹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碱泉子农场叫了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拣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宗华一怔，呵呵地笑了：老和，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

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将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

呵呵呵……

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 30 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情绪得到转换——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翳，留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头骨、腿骨、肋骨……而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半闪着怕人的目光。他的半截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的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

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瞠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艰苦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

我把这话一说出来，高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在这里帮你找景超，就看见了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的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

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

如今我已经离开坟茔回到高宗华家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就特别黑呀，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是景超，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

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故死去的难友啊！

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

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去照像馆冲洗胶卷时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陈迹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我却没拍下照片，这太遗憾了！

我于9月30日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锹去掩埋那半具尸体之际，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红绒衣里边的确如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的衬衣！

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红格子了！

高宗华用铁锹铲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骨头，将其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坟穴里，盖上了土。

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

和桑60岁退休。她今年才67岁，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她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她夜以继日地写，反复修改。作者说她，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她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人民，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今后再能重演。